

# 张謇与 20 世纪初年的博览会

## —— 一个跨文化互动的历史观察

(摘要)

马敏、艾险峰

(华中师范大学)

发源于西方的近代博览会对中日两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起过重要作用，有力促进了两国的近代化过程。尤其张謇和涩泽荣一这两位著名的实业家和东亚近代化的开拓者，更是深受当时风靡全球的博览会事业和思潮的影响，分别对中日两国博览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系两国近代博览事业的最重要开拓者，也是通过博览会这种媒介开展民间外交的积极倡导者。

本文拟通过论述张謇与 20 世纪初年博览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讨当时中、日、美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民间外交的互动。

### 1、张謇与 1903 年日本大阪博览会

张謇对近代博览事业的认识，大致萌发于他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5 月东渡扶桑，参观日本的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即大阪博览会。

借开博览会之机东游日本，不仅使张謇对博览会这一西方文明的产物有了切身的了解，而且以此为契机真正了解了日本社会，见识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实际发展。

东游日本参加其内国博览会，成为张謇实业生涯的一个新起点。这次日本之行，使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兴起和来自西方的各种新事物有了亲身的体验，尤其对邻国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的迅猛发展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仔细的了解，这一切都成为他后来在中国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南通推行各项近代化建设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十分巧合的是，尽管比张謇早了若干年，但日本近代实业之父涩泽荣一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面认识和深入了解，也是始于对万国博览会的参观。1867 年，时为第十五代幕府将军的一桥庆喜，派其弟昭武作为幕府的代表出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初露头角的涩泽荣一被选为昭武的随从跟随前往。这次长达两年的访问，构成涩泽荣一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 2、张謇与 1906 年意大利米兰渔业赛会

张謇根据 1903 年考察日本大阪博览会所得经验，并研究了历次渔业赛会的情况后，对此次中国参赛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清政府赛会政策的转变。

其一，建议成立“七省渔业公司”，由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自筹展品赴会。

其二，张謇提请清政府一定要注意此次渔业赛会所暗含的领海主权问题，主张利用本次渔业展览，趁机宣示中国海权。

### 3、张謇与1910年南洋劝业会

于1910年在南京召开的“南洋劝业会”是清末规模最大的首次全国性博览会。这次劝业会持续了近五个月之久，除边疆省份外，各省均建有自己的展览馆，英、美、德、日各国也有展品展出。全部展品估计达10余万件，各地前来参观的人达20余万人次，获奖展品共达五千余件。

在清末这次最重要的博览会中，以张謇为首的一批东南绅商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是这次全国性博览会的实际组织者。

### 4、博览会与中、日、美之间商人的民间交往

南洋劝业会的举办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实业家和商人之间的交流。日本和美国都曾先后派出实业代表团前来参观考察，主要与中国商会进行了会谈和交流。

日、美两个实业团的访华，其真正的意义和成果，除加深了中外商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为三国商人之间以后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开辟了通道。其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两国实业团均向中国商会发出了回访的邀请，并借此进一步开展了“商人外交”或“国民外交”。

中、日、美三国商人通过参加博览会和实业互访所进行的交流活动，直接促使了“国民外交”或“商人外交”思想的产生。正是在商人们的跨文化交往过程中，一种新的有别于政府之间正式邦交的民间外交活动应运而生，它虽然与经贸往来密切结合，但其真正的目的却在于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发展纯民间的友谊，做一些政府正式外交鞭长莫及的事。这种外交方式在两国政府间存在歧见和麻烦时，往往不可或缺，有时还能起到推动正式邦交的作用。

当时中日最重要的实业界领袖人物张謇和涩泽荣一都是“商人外交”、“国民外交”的力倡者和践行者。日本来华实业参观团团长近藤廉平在其回国后的总结报告中便曾提到，他们的访华系涩泽荣一“国民外交”思想直接推动的，“现在涩泽男爵赋予我辈一个责任，充当联系中日两国的纽带，我辈纵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辞。此次好不容易才开始的国民交往，如被视为过眼烟云，轻易抛弃，将是两国的大不幸。”<sup>1</sup>张謇则在中日、中美两国商人外交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多次参加了两团的接待和晤谈，而且也积极推动中国实业团的回访，一度还准备亲自率团访美。

在同时代人当中，张謇之所以能较早注意到博览会、博览馆等新事物在推动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巨大作用，并殚精竭虑、身体力行地倡导之、实践之、推进之，“做了三十年开路先锋”（胡适语），就在于他不单单是一个士绅和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事业家”，一个有着强烈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儒商”。就此而言，可以认为，张謇之从事近代博览事业和商人外交，其着重点，亦不在于经营和获利，而更为看重的是这一事业的巨大启蒙和教育功能，所谓“父教育而母

<sup>1</sup>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实业”。惟其如此，他才能不计功利、不计成败，愈挫愈奋，成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少数开创人之一，成为能与涩泽荣一在日本一样的“近代实业之父”。